

试论北宋西北边区的民事经济法令

李文军

(南京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北宋的西北边区处于宋夏边防要冲,民族成分复杂,对北宋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宋政府根据形势需要,灵活务实地颁布了一系列民事经济法令来调整边区蕃汉民众的经济生活。这些法令的实施,促进了蕃汉民众之间的经济交流,对西北边区的安宁稳定 and 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北宋;西北边区;民事经济;法令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07)03-0092-04

北宋的西北边区系今甘肃、宁夏、青海东部以及陕西的部分地区,包括鄜延、秦凤、泾原、环庆四路以及神宗熙宁开边之后的熙河路,即通常所说的“关西五路”。这一地区民族成分非常复杂,除了“风俗相类”的吐蕃、党项之外,还有回鹘、达怛等众多部落民族。由于这里位居宋和西夏的边防要冲,北宋政府特别重视这一区域的治理,并灵活务实地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边区蕃汉民众的经济生活,颁布了一系列民事经济法令,以保证边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一、民事经济法令的内容

(一) 关于土地所有权

西北边区的土地主要归蕃民占有。北宋政府为了安抚蕃民,使他们有“蓄积室庐之便,乐土重迁”,实现对边族地区的统治,一贯奉行保护蕃民土地占有的政策,规定内地百姓及地方官司,不得任意侵夺其固有地产。为此,北宋建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严厉禁止西北边区的蕃汉土地买卖。但是,由于蕃汉民众间相互联系的加强和私人占有的封建土地制度自身的局限,土地买卖和转让一直禁而不止,宋真宗和宋仁宗时期,土地转让迅速盛行起来。“环庆边人多市属羌之田,致单弱不自给,即没敌中”^{[1](P96)}，“势官富姓,占田无限……重禁莫能止焉”^{[2](P4164)}。这种情况威胁到蕃民的基本生活和边区的稳定,北宋政府随即发布法令采取措施来遏止边区土地兼并。曹玮任边官时,勒令汉户百姓将土地归还属羌,并规定以后有违犯者,举家迁配内地^{[3](P3277)}。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

年),宋政府颁布了对蕃民的土地保护条例,规定“汉户弓箭手不得私自典买、租赁,合种蕃部地土”^{[4](P7257)},如有违犯,原“典买租赁合种百姓弓箭手并科违制之罪,仍刺面配向南远恶州军牢城”^{[4](P7258)}。神宗初,蔡挺知渭州,凡蕃户以土地向汉户质押的,由官府借钱给蕃户赎回,官府每年抽取什一之息。这项措施后来成为定制在西北边区施行。由此可见,北宋政府对蕃民土地所有权的保护是十分严格的。

除蕃民自占土地之外,西北边区还有“官田”和“闲田”两种土地形式。前者指官府直接掌握的土地;后者指既不属于蕃民自占,也不属官府掌管,无人耕种居住的闲置土地。官田和闲田一般由政府分配给蕃汉弓箭手人员耕种,陕西弓箭手人授田两顷,有马者加马口多授50亩。这些土地采取免纳租课、以役代租的经营方式,弓箭手不用缴纳租赋,只在有战事时保卫乡土、随军杀敌即可。这种土地经营方式使北宋政府获得了二三十万战斗力强、不费兵饷的士兵,并成为西北边防的一支劲旅。此外,官田也有一些分配给民户(包括招纳、归投的边外部族民户和当地蕃汉民户)租佃耕种。王安石变法以后,土地买卖禁令有所松动。在官田和闲田不足时,官府也收买一些蕃部土地作为官田支配。

(二) 调整债权债务关系

西夏属于游牧经济,某些生活用品不能自给,要依靠北宋获得,而西夏的池盐等物品也是汉族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双方虽时有战争,但互通有无的经济贸易活动相当频繁。北宋政府对交易中的债权债务

务关系,尤对蕃民的债权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法律保护。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针对“诸色人于熟户蕃部处赊买羊马,借贷钱物”^{[4](P7258)}等现象,北宋政府颁布了《淳化法令》,规定所有军人百姓不得赊贷、脱赚、欠负蕃人钱物。如果蕃人到汉界买卖,在得到宋政府允许后,“令汉户牙人等于城寨内商量和买,不得侵欺蕃人及赊买羊马,亏欠钱物”^{[4](P7258)},如有违犯,“捉送秦州,依格法勘断”。当时环州“民与吐蕃相贸易,多欺夺之,或至斗讼,官又弗直,故蕃情常怨”^{[5](P776)}。崇仪使柳开知环州,“乃命一其物价,平其权量,擒民之欺夺者置于法,部族翕然向化”^{[5](P776)}。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宋政府又颁布《景德法令》,对禁止亏欠蕃民钱物、保护蕃民利益有了更明确的规定,如“秦州诸人自今或于蕃部买卖并各将钱物交相博买,不得立限赊买及取觅债负”^{[4](P7258)},以避免引起纠纷。“诸色人公然与蕃部取债及欠负蕃部钱物不还者,即追领正身,以所欠钱物多少分等定罪,并差人监督催还,偿还全部欠债”^{[4](P7258)}。如果欠蕃部钱物较多且从情理上看属于欺诈的,则追偿更严,即使正身逃脱,也要“追禁亲的骨肉及一面紧行追捉,候获日,依格法断”^{[4](P7258)}。若欠负巨额钱物者,“即奏裁”,交由中央官府处理。通过这些法令,北宋政府有力保护了蕃民在交易活动中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

(三) 对赋税的规定

1. 土地赋税。北宋政府对西北边区土地赋税的征收分为定额赋税、不定额赋税以及不纳赋税三种形式。分属正州县的部族民户,一般编入地方户籍,同汉民一样,称为“熟户”,就其占有的土地向官府定期交纳赋税,但赋税额比内地其他各路的省民低。不定额赋税是蕃部象征性的缴纳的税物,税物多少与其土地和人户的多少没有直接关系,一般由蕃部自定,官府对其交纳的时间和方式也没有强制性规定。这种不定额赋税经济意义不大,只是表示蕃族人户具有归附宋朝统治的愿望,通过赋税交纳,建立起一种经济联系,有利于北宋政府对蕃族的羁縻统治。在西北边区广泛存在的一种赋税形式是不纳赋税,“自来田业并是父子相承,典买往佃,但无徭赋”^{[6](P1161)}。陕西的鄜延路,宋初因荒阜贫瘠,熟户“占田者不出租赋,而倚为藩蔽”。蕃部中的弓箭手人户只负军事义务,不纳租税。对于耕种官田的招纳归投之部族民户,宋政府出于安抚笼络的目的,也不立租课。此外,豪酋大族的领地以及熙宁开边后取得的新附地区,宋政府也不征收租税,让其自己经营以保证边区的稳定和安宁。

2. 商业赋税。北宋时期商业交易十分活跃,宋政

府一改传统的“重义轻利”而转为“义利并重”,插手民间贸易活动,对其进行积极的管理并从中获取利润。西北边区蕃汉之间互通有无的民族贸易十分兴盛。宋政府规定,重要的物品交易必须订立契约,向政府缴纳契税取得政府承认后方为有效。茶和酒作为西北少数民族的生活必需品,是蕃市上交易的重要物品,北宋政府严格控制其生产和流通,投向市场的茶和酒要由官府征收税课。在秦州四寨及古道堡,宋政府设置了监酒使臣,专门征收酒税。王安石变法期间,政府广行《市易法》。元丰二年(1079年),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李宪上奏:“蕃商与牙侏私市,其货皆由他路避税入秦州”^{[7](P4552)}。施行《市易法》的目的就在于杜绝私贩,征收商税以分得边区贸易的部分利益。宋政府为此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市易司。王韶在请置市易司的上奏中指出:“蕃中物货四流,而归于我者,岁不知几百千万,而商旅之利尽归民间。”如设置市易司,“稍笼商贾之利,即一岁之入,亦不下一二十万贯”^{[8](P11025)}。宋政府于熙、秦、凤、河、岷、通远军及兰州等地设立市易司,以官钱作本,委派专人负责管理,并且雇用博买牙人引致蕃货赴市易司买卖,规定:“如敢私市,许人告,每估钱一千,官给赏钱二千,如此,则招来远人,可以牢笼遗利,资助边计”^{[9](P10933)}。

(四) 禁榷律法在边区的实施

北宋冗官冗军惊人,加上给辽的岁币和西夏的赠赐,财政十分匮乏,禁榷是其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宋代禁榷的范围有所扩大,除了传统的盐、酒、茶外,矾、铁、煤等也均列为禁榷物种。禁榷律法中,以盐法、茶法、酒法最为重要和完备。盐、茶、酒是西夏民众不可缺少的日常消费品,对其生产和销售进行严格控制除了经济意义之外,更是对西夏进行牵制羁縻的重要手段。北宋酒的生产由政府掌控,酿酒的酒曲由官府垄断,民间私酿要受严厉制裁。酒的流通也由政府专营,宋在秦州设置了监酒使臣,专管酒的经营和酒税征收。王韶在熙河开边时一次曾收得30多处酒坊,全部改由政府国营。茶的流通先由设在成都府路的茶场司主管(因榷往西北边区的茶多由四川生产),后来改由茶场司和买马司合并而成的都大举茶马司主管。茶马司在陕西下设50个卖茶场,统一收购茶农的茶叶,然后向茶商及民众出售。宋政府规定:“凡民茶折税外,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值论罪。”^{[10](P4478)}盐的生产和流通由中央三司中的盐铁司总管,各地则分区由官府经营。在西北边区,咸平中设陕西制置使主管青白盐的专卖,后改由陕西转运使主管,严厉禁绝私贩。蕃部来交易也必须在政府

指定的榷场和市中设场务进行。除了设置机构专门管理盐茶酒的产销之外,宋政府还前后颁布和制定了一系列禁令,对于违犯禁榷律法私市之人严查论罪,最高可处死刑。但是,由于官盐和官茶价格太高,造成“公私大有烦费,而边民顿无入市”,私贩屡禁不绝,北宋政府后来不得不对榷禁有所放松,允许商人参与盐茶买卖。

(五) 对外贸易的法律规制

宋和西夏的贸易活动十分频繁。北宋政府一方面采取较为自由和宽松的政策促进边境贸易,另一方面根据边境形势的变化,对双方贸易又有所控制和干预。

1. 对交易物品的限制。除了禁榷律法规定的物品外,宋政府为了国家安全和边区安宁,对其他一些物品也严禁私自交易。其一是马。宋政府为了防止马匹大量出售给西夏而被训练为战马对宋不利,严禁私市马匹。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二月,审刑院制定《秦州私贩马条例》,规定私市马匹者“自今一匹杖一百,十匹徒一年,二十匹加一等,三十匹奏裁,其马纳官,以半价给告事人”^{[11](P1117)}。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下诏:“诸汉蕃义军,义儿私易卖官印马,徒一年”;对于老或病退的马匹,亦须呈验官府后印“官马”字样方许买卖,若不申报官府而出卖“各减私易罪五等”^{[12](P6078)}。其二严禁买卖妇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下令“禁内属戎人私市女口,吏谨捕之,违者弃市”^{[13](P539)}。其三是铜钱和铁钱。因为铜铁钱可以被销融之后制造兵器,所以宋政府严格控制钱币流向境外。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针对“西北内属戎人,多货帛,于秦阶州易换铜钱,出塞销铸为器”的现象,太宗诏令“自今严禁之。吏民敢阑出铜钱百以上,论罪有差”^{[14](P423)}。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又规定,河、岷、兰州缘边,“诸蕃官般擦入汉卖买回日,许由城寨搜检,不得带钱入蕃”^{[15](P10020)}。

2. 对交易场所的规定。神宗熙宁九年规定:“川陕商旅不许挈家属入威、茂州,及本处人与蕃部交易,止得于州县城内,不得出接连蕃部处城门。”^{[16](P6780)}如果搬迁住所及家属探亲,必须经地方州县政府发给“公凭”。元丰四年(1081年)又规定蕃马必须在政府指定的买马场交易。“蕃部马入汉界,并令入买马场,除中官外,价高马许诸色人就场交易”^{[17](P7611)}。

3. 对交易对象的限制。西北边区的边界贸易受宋夏关系影响很大,双方时和时战,贸易也时断时续。北宋在与西夏作战时就禁止边民与夏人交易。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下令禁止陕西河东边民与夏人贸易。同年四月,“严行禁断延边蕃汉人户不得与西贼私相交

易”,并立重赏鼓励告发违犯禁令者。“自今有违经略司并所管官吏,当刻罪重断”,由转运司觉察处理。次年,再以累降指挥形式重申,陕西、河东诸路“止绝汉蕃民毋得与西人交市”。哲宗时期也曾经禁止边民与西夏贸易。这样做无疑是为了羁縻对中原物资依赖性很大的西夏,以求有利于国家安全。但在实施的过程中遭到边民抵制,打了很多折扣。

二、北宋西北边区民事经济法令的特点

(一) 注意保护蕃民利益

北宋政府通过多项法令来保护蕃民的权利:在内地军州“不抑兼并”时,边区却严格限制土地买卖,以保护蕃民对土地的占有,禁止汉户百姓和官府侵夺蕃民之田,违者科以违制之罪并刺配南方偏远州军牢城;对蕃民土地赋税的征收也采取了很多优惠政策,不纳赋税成为边区最主要的税收形式,即使交纳赋税的也比内地省民为低;在商业交易活动中也十分注意保护蕃民的物权和债权,多次发布法令,禁止对蕃民的侵欺、亏欠和赊买,对于亏欠蕃民钱物者严加追查,除追偿钱物外还要进行严厉制裁。此外宋朝皇帝还多次下诏保护蕃民的人身权利及其居住环境。这些都体现了宋政府对蕃民的重视。保护蕃民法令是宋代民族政策在西北边的具体化,其主要目的就是确保边区蕃民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安居乐业,不致因为屡遭侵夺,生活难以为继而引发骚乱或投向西夏、吐蕃,反映了北宋政府较强的忧患意识。

(二) 侧重于为政治目的服务

北宋政府在西北边区的各项经济政策都是从国家安全考虑的,不强调经济利益。诚如宋仁宗所言:“朕所爱者,土宇生民尔,财物非所惜也。”西北地区土地多为蕃民自占田,出于安抚笼络的目的,宋政府并不强制其向国家缴纳田赋,蕃汉弓箭手营田也不纳租赋,因此西北的土地对北宋的财政收入贡献十分微小。神宗开边之初,熙河“虽名一路,而实无租入,军皆仰食他道”^{[18](P10581)}。徽宗朝“熙河鄯湟疆土虽广而地利悉旧属羌,官兵吏禄,仰给县官”。对交易活动的调整也体现了宋政府安定边区的考虑。太宗时规定,边区诸寨监押官员,不按《淳化法令》的规定保护蕃民债权,引起蕃人不满,造成蕃部不宁的,由秦州“密具申奏,当行严断”。宋政府在秦凤路设市易司管理西北边贸,为了防止西夏训练战马和铸造兵器威胁边境,严格控制马匹和铜铁钱币流入西夏。对其他一些战略物资的交易也控制很严。此外在战争时期禁止边民与西夏的一切交易同样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三) 经济法令的制定因时因地制宜，比较灵活

以土地赋税的确定为例，北宋根据国家安全、边区经营及经济发展的不同需要，对西北边区的土地分别规定了定额赋税、不定额赋税以及不纳赋税三种不同的税制。对于离内地州县较近的蕃族熟户，与内地省民一样定期交定额租赋，只是数额略低；纳土归附的部族则象征性地交不定额赋税，与进贡类似，只是藉此与宋政府建立起一种经济关系，表示其隶属和臣服于中央政府的管辖；对于与西夏、吐蕃直接相邻的边防重地，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地区以及新开拓地区，宋政府则不征收赋税，而注重加强边防力量和安抚蕃部。出于同样的目的，边区的土著武装人员——弓箭手的土地和蕃族大户的土地也不纳赋税。又如土地买卖问题，北宋初期为了确保蕃民生计和边区安宁严格禁止蕃民出售土地。但在特殊情况下，如为了资助弓箭手养马，则允许与汉界相邻的蕃部属户出售其土地。王安石变法时，出于“蕃汉为一”、“变夷为汉”的目的，取消了边区土地买卖禁令，允许蕃汉民众自由交易土地。但同时对于土地相对贫乏的环、庆、原等州，仍然依旧法严厉禁止土地买卖，违者治罪。这些都体现了北宋制定边区经济法令的灵活性。

综上所述，北宋政府通过灵活务实的边区民事经济法令对西北边区的土地所有权、交易活动、赋税征纳等进行有效调整，保护了蕃民利益，增进了民族友谊，对边防安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从经济角度看，这些法令促进了蕃汉贸易，丰富了边疆和内地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推动了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 [1] 曾巩．隆平集：卷 9[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
- [2] 脱脱．宋史·食货志上一：卷 173[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09[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4] 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185 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5[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6]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 12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7] 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139 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8] 脱脱．宋史·食货下八：卷 186[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9] 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139 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10] 脱脱．宋史·食货下五：卷 183[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1[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49[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4[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9[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14[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77[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14[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8] 脱脱．宋史·王韶传：卷 328[M]．北京：中华书局，1979．

〔责任编辑 郭超〕

On the Civil and Economic Statutes in the Northwest Border Area of North Song Dynasty

LI Wen-ju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northwest border area of North Song lied in border defense strategic area between North Song and West Xia. Complicated races component in this area was very important to North Song's national security. Song government flexibly enacted a series of civil and economic statutes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in order to adjust the minority's and Han's economic lif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statutes promoted the economic exchange between Han people and minoritie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o the peacefu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west border area.

Key words: North Song dynasty; northwest border area; civil and economic; statutes